

導論——

創造性轉化的契機：漢學的跨文化面向

莫加南 Mark McConaghy*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於民國 110 年 7 月始執行教育部標竿計畫「跨文化漢學之島：國際漢學平台在中山」，擘劃以「跨文化漢學」為核心的實體與數位平台，旨在成為南臺灣首屈一指的漢學交流基地。本次「跨文化漢學專輯」由平台計畫主持人與《文與哲》編輯部共同合作出版，共刊登四篇文章，每篇皆探索了跨文化漢學的不同面向，茲謹將此四篇文章與臺灣中文學界分享。

何謂「跨文化漢學（Transcultural Sinology）」？為何在此時此刻，要提倡這樣的概念？廣義而言，漢學指的是與中華世界的相關研究，涵蓋了文化、歷史、語言、思想、宗教、政治與家庭結構等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所有面向。狹義來說，漢學研究的對象為中華世界的「文史哲」傳統及其與現代命運的關聯，此一傳統有其淵遠流長的歷史脈絡，自先秦以來則兼蓄各種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論述典範，如今日仍存於生活之中的先秦諸子、各家學說。漢學從來不是僵化不變，恰恰相反的是，其弔詭地容納不同思維模式，證明在一文明體系中可以同時存在多元及矛盾的思維方式，如儒家由上而下的「道德仁義」規範、道家「柔軟勝剛強」的去中心主體，甚至是法家嚴格的「刑名」思想，都兼容並蓄地存在於中華文明的世界裡。自漢代以降，佛教入主中原，促成中華與印度文明的深刻交流，而「中華世界」也開始將域外的「他者」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到了魏晉時期，玄學對「有」與「無」關係論述的本體論加深了中華思想的多元性。十六世紀開始，西學東漸與耶穌會士訪華，漢學逐漸在歐洲興起，漢學內部與歐洲文明展開更廣泛的跨文化視野。同時，宋明理學與心學深化了儒家對主體、客體、本體、氣、善、惡等概念的反思。也必須強調的是，這個璀璨多元的文明並不屬於任何政權或王朝，穿越了過往中國朝代更迭的歷史，影響之深遍及日本、韓國、越南、臺灣、東南亞與中亞等亞洲各處。

十九世紀末以降，漢學家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即：在一個由歐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框架定義的世界中，如何安放傳統中華文明的秩序？這樣的問題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為中華世界帶起一波波革命性的浪潮及後續的改革運動，為整個社會結構與知識體系刻下深遠的影響。「跨文化漢學」旨在向種種全球化的歷程與轉型發難，既承認「現代」對過去所帶來的裂解，但又同時謀求了解活生生的傳統對當代中華世界的影響。

本輯的四篇文章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探索漢學的跨文化特質，如全球脈絡與其並存不悖的文化思考。首篇以彭小妍教授的〈漢學研究的跨文化轉向：論自我與他者的弔詭共生〉作為本專輯的方法論總指導，旨在為跨文化研究與漢學建立一相互理解的對話。本文首先說明跨文化研究是「關注各文化的混雜本質、各文化間的相互連結，並體認他者文化的不斷滲透，如何成為自我不可分割的部份，進而促成自我的轉化與創新」，此立場不同於幾十年來在臺灣盛行的後殖民理論。對作者而言，「後殖民研究的二元劃分不可取，因為它將二元兩端的恆久辯證關係簡化了。二元化論述強調霸權與弱勢、中央與邊緣、主要與次要的二元劃分，但如果仔細檢驗，這種絕對的二元劃分是難以成立的。」與其強調一種絕對的、向內觀看的自我意識，不如體認各種外來因素的正面成分是如何讓本土文化轉化為更多元、複雜的樣態。彭小妍向漢學家們提出了非常關鍵的問題：「就跨文化漢學而言，在那些關鍵時刻因外來因素的介入，促成了中國創造性轉化的契機？」並提出在中國歷史上三個重要的創造性轉化的契機，如漢朝之後佛教入華、清末民初中日歐之間的跨文化語彙、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通三統」時代。

本輯將彭小妍對理論的反思作為出發點，帶領讀者進入到三種不同的跨文化漢學的語境裡。這個跨文化旅程的第一站為民國初年，以及那個年代裡著名的玄學與科學論戰（1923-1924）。吳冠宏教授〈湯用彤玄學典範論述的歷史探源與文化反思——從民初科玄論戰談起〉一文探索魏晉玄學與西方哲學對話的可能性，並彰顯前者在中國本體論上的重要性；如其所言，湯氏「借鏡西方哲學及其發展歷史作為參照之背景，站在知識論與本質論的位階，揭示『言意之辨』的新方法與新眼光，找出其何以從名理（認識論）走到玄學（本體論）的發展，進而從魏晉玄學的殊趣中為中國文化另覓出路」湯氏所關心的是，玄學作為學問特別關注在心靈轉化的本體論境界，又說：「玄學家追求超世之理想，而仍合現實的與理想的為一」。吳冠宏強調，湯氏的論述超越了玄科論戰的二元對立的方式，拒絕把科學與人生觀看做是無法融合的絕對領域，其更認為：「湯用彤的玄學論述固然在『理性』的路數上是鮮明的，更是其跨越將中西文化簡化為科玄兩派之框架，而一展玄學亦有其科學方法及思辨性格的成績，然就『體驗』而言，在當今感性

復甦的時代，則未嘗沒有進一步開拓的空間。」由此可見，吳冠宏的文章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湯用彤在跨文化漢學上的實踐，在古今中西對話當中打破二元分立，並更清楚地體認到客體與主體、分析與直覺、科學與人生觀間的混雜交融。

跨文化旅程的第二個地點為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羅景文教授在其文章〈漢學，當何如？——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漢學」相關論述之研究〉思考越南漢學家在法國殖民地的統治下如何思考漢學的未來。法國政府在 1905 年實施教育管制，決定小學教育階段使用法語與越南羅馬字作為教學語文，漢字並非官方認定的教育文字。殖民政府在 1919 年正式廢止越南科舉制度。作者細究法國殖民政府所發行的官方刊物《南風雜誌》（1917-1934）漢文版，探究在漢字與漢學被殖民政府視為「古董」的專業學門當下（而非普遍的教育、道德與精神基礎），越南的漢學家如何回答「漢學，當何如？」這樣的問題。作者的分析顯示，雖然有越南文人贊成法國殖民政府的立場，對漢學抱持負面的態度，但仍存在著不同的聲音。羅景文讓我們看到「在殖民語境罅隙下所流露出來對漢學的重估與肯定」。比如越南的文人范瓊（Phạm Quỳnh, 1892-1945）將漢字視為從中國傳播來的新學之重要媒介，在這個脈絡之下，保留和發揚漢學成為重要的反殖民策略。相信這樣的反殖民策略——以傳統漢學的思想資源鞏固社會公民的道德修養，以及以漢字作為引介中國大陸的重要知識媒介——對臺灣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此與臺灣日治時期的文人回應外族統治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處。

最後，旅程終點為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謝薇娜（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教授所撰述的〈作為世界觀的漢學——阿列克謝耶夫（V. M. Alekseev, 1881-1951）的中國古典詩論探析〉分析俄羅斯漢學先驅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詩學的論述。謝薇娜分析阿列克謝耶夫漢學生涯的亮點，如 1916 年對司空圖（837-908）《詩品》的研究、在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介紹關於中國文學和詩歌的講稿（*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Six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et au musée Guimet*, 1926 年）及後期的比較文學探索，分析陸機（261-303）、宋濂（1310-1381）、袁黃（1533-1606）、賀拉斯（Horacius, 65 -8 B.C.），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1636-1711）等作家在中國和歐洲古代、文藝復興時期的詩學特色。作者認為阿列克謝耶夫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為將中國詩學帶到世界詩學的脈絡裡去，如其所言：「阿氏透過司空圖的研究進行中國和西方的比較研究，是為俄國漢學史上之大膽創舉，側重於對『中國只是中國人和漢學家的中國』的反省，藉此比較，阿氏強調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非常重要環節之一。」

同時，阿列克謝耶夫也為了俄羅斯漢學奠定了嚴謹的語文學（philology）學術方法如「文本細讀、翻譯、詞彙分析」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史達林（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8-1953）時代的俄羅斯，漢學並不是安全且與政治無關的學術領域，其對中國「道」與「詩」的分析也受到了極端專制的打壓，作者指出阿氏「在 1937 年出版了 1926 年在法國巴黎 Guimet 博物館中國文學和詩歌的六講的講稿，此書遭逢當時俄國學術界嚴厲批評，阿氏的作品被稱為『屬於蒙昧主義、有破壞政治的內容假作品』等，亦被認為具有代表西方國家漢學中的法西斯主義趨勢。」阿列克謝耶夫能夠面對這樣的意識形態環境，不放棄自身對漢學的承諾，在晚年持續堅守中西文化研究的工程，令人折服。

綜上所述，本輯四篇文章促進我們對漢學跨文化性質的理解，從中華民國、越南與俄羅斯三個不同國家情境所展現漢學的多元能量、價值重構、與他者進行對話和互相轉化，甚至以漢學作為反殖民的策略。希冀上述四篇能為讀者對跨文化漢學有更深的認知和體悟。漢學作為我們豐碩的文化土壤，亟盼能在不同的語境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回應現代生活的各種挑戰與困境。